

宣仁门遗址时代辨析

韩建华

关键词：洛阳城东城 宣仁门 门道基础 唐宋变革

KEYWORDS: Eastern City of Luoyang City Xuanren Gate Doorway Foundation Tang and Song Reform

ABSTRACT: Xuanren Gate was the east gate of the eastern city of Luoyang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throug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Its location and structure have been confirm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owever, the date of Xuanren Gate was still in debate. Based on the appearance of stone-lined doorway foundations as well as stone and brick paved roads, alongside records in the *Yingzao fashi* and figural images in Song-Yuan paintings, in addition to 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yard site in the eastern city and its gat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Xuanren Gate was buil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addition, taking analysis of the date of Xuanren Gate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study also addresses the urban archaeology of “ancient-modern overlapping” cities, the paradigm shift of “Tang and Song reform”, the writing of *Yingzao fashi*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uoyang city plan,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宣仁门是隋唐至北宋时期洛阳城东城的东门。东城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和皇城之东，北接含嘉仓城，南临洛河，以东为洛北里坊，其性质与皇城相近。宣仁门是东城东垣唯一的门址，向东与郭城的上东门相对，之间为洛北里坊区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该门有明确文献记载，如《大业杂记》载：“东城东有宣仁门”。《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东城在皇城之东，东曰宣仁门，南曰承福门”。另在《河南志》中，隋、唐、宋不同时期的“城阙古迹”条下，均记载东城“东面一门，曰宣仁门”。可知自隋唐至宋，宣仁门的名称未发生变化。

1996~1997年，宣仁门遗址被发现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其时代目前尚难做出确切的结论”、“从其建筑特点观察，

既有唐代中期以前的建筑风格，同时又具有许多宋代城门建筑的因素，应当说，它是隋唐城门向宋元城门的过渡形式”^[1]。该门址的特殊结构是以往发掘的唐代两京城门遗址所不见的，是研究洛阳城唐宋变革的重要实物资料。资料一经发表，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从宣仁门考古发现的门道基础做法出发，利用《营造法式》和宋元绘画材料，结合东城考古发掘的衙署庭院遗址和宋代门址，对宣仁门遗址时代进行辨析。

一、宣仁门遗址的形制结构

经考古发掘确认，宣仁门遗址坐西朝东，是一门三道结构的木构过梁式城门，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但受发掘区域现代建筑的影响，仅揭露出墩台、南门道、隔墙

作者：韩建华，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中门道。其中,墩台仅发掘了南侧局部,夯筑而成,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32米。南门道完整揭露,中门道仅局部清理,门道间有夯筑隔墙,宽2.9米。

南门道结构保存完整,宽5.36、进深18.32米(图一)。门道南北两侧对称铺砌土衬石,土衬石深埋在门道夯土中,其上面与门道砖铺路面基本齐平。土衬石之上直接铺地袱石,地袱石彼此相连无空隙,这是和以往唐代两京发掘的城门遗址不同之处。以地袱石外沿为界,土衬石外露0.16米。地袱石上凿有长方形榫窝,以立排叉柱。榫窝共17个,等距分布。排叉柱间砌砖为壁,砖壁外侧有草泥墙皮,墙皮上涂朱。排叉柱一半露于外,一半嵌入门洞壁之中。土衬石长0.58~1.03、宽0.48~0.7、厚0.22~0.25米。地袱石平面呈长方形,制作规整,长0.4~1.2、宽0.55、厚0.28~0.3米。

门道路面由两排铺石面与三排铺砖面相间构成。铺石路面应该是车道,由石板横向平铺,每排铺石宽0.85~0.95米,间距1.5米。铺砖路面位于铺石路面的两侧和中间,两侧各宽1.29米,中间宽0.53~0.67米。由长方形砖横向侧砌,砌砖有大小之分。铺砖路面东西两端有止车石。

门道中部保存有较好的石质门构件,

包括门砧石、立颊石、门限石和将军石。门砧石和立颊石保存较好,结构完整。门砧石在门道中部南、北两侧对称设置,门砧石部分嵌入石地袱内,顶面凿有规整的凹槽,槽内嵌立颊石,旁边有方形榫眼,中有铁臼槽与铁鹅台。门限石与路面基本齐平,将军石系在门道中央、两侧门砧石之间设置的挡门石,嵌在门限石中间。另外还发现止扉石、止车石和撞石等门构件。止扉石位于门砧石西侧南北两壁下,由两块方石组成,止扉石的台面中心凿有圆形榫眼。撞石位于门道四角,为防止车撞而设,东西宽0.38、南北长0.43、高出地面0.78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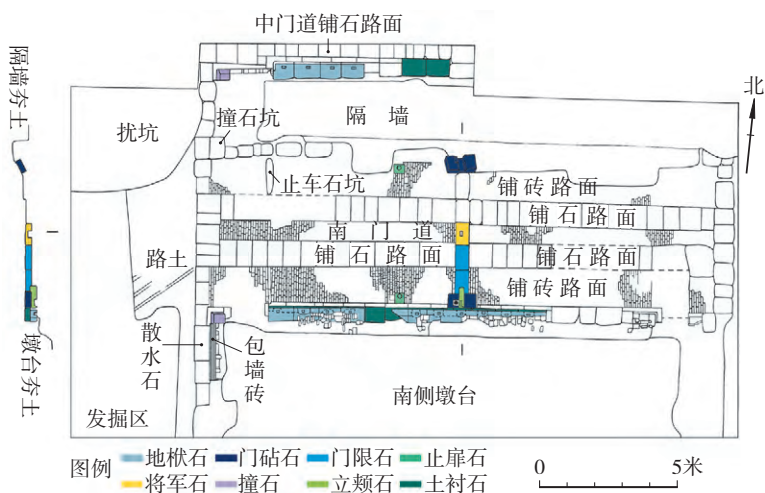
中门道与南门道的形制基本相同,门道内也清理出土衬石、地袱石、撞石和铺石路面。从铺石位置推测中门道可能全部铺石。

二、宣仁门遗址的时代辨析

宣仁门遗址的门道基础做法、门道铺砖石路面是前所未见的,发掘者根据遗物特征初步推测其时代在唐代中期到宋初^[2]。该遗址发掘简报一经发表,其时代成为讨论的热点,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宣仁门遗址的时代为隋唐至五代。隋唐时期宣仁门为一门三道,五代以后南北两个门道被封,仅留中门道以供

出入,宣仁门变成单门道结构。此观点最早由陈良伟提出,与其在发掘简报中判断的“唐代中期到宋初”有明显变化^[3]。徐龙国基本接受此观点,认为宣仁门隋唐时为一门三道,宋代时南北两个门道被封,仅存中门道,成为一门一道形制^[4]。其观点只是在表述上有些变化,同样认为宣仁门遗址的时代为隋唐至五代。李鑫等按门道数



图一 宣仁门遗址南门道平、剖面图

量分型，依据门道内柱础石的排列及路面铺设等情况分式，也把宣仁门遗址的时代推断为唐晚期至五代^[5]。

另一种观点认为宣仁门遗址为宋代门址，近年来此观点成为主流。在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的发掘报告中被首次提出，报告指出南门道砖石铺路的使用下限应该到宋代，同时认为南门道封堵的时代为宋代晚期^[6]。石自社归纳总结了宣仁门遗址的结构特点，认为宣仁门遗址应为北宋时期使用的城门建筑结构^[7]。该观点强调了“使用”时代，对于门址的建造年代并没有提及。汪盈、董新林根据傅熹年所列城门门道基础做法的三个类型分析，认为宋代洛阳城宣仁门遗址是其中Ⅲ型门道的代表^[8]。傅熹年所列第Ⅲ型门道基础是“用土衬石，石上用石地袱，袱上立木柱”的做法，是宋、元以来《营造法式》规定的做法，在宋、元绘画中都有表现^[9]。这个表述更明确了宣仁门的宋代特征。

以上两种观点中，认为宣仁门遗址属于宋代的观点是科学且稳妥的。该观点抓住了门道基础做法的时代特征这个关键。宣仁门为“一门三道”结构，其南门道做法为门道底部安置土衬石，土衬石之上直接放置地袱石，地袱石顶面凿有长方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在地袱石下面增加土衬石，这是与以往发掘的隋唐时期城门门道的不同之处。

关于土衬石，《营造法式》记载：“造城门石地袱之制：先于地面上安土衬石，上面露棱广五寸，下高四寸。其上施地袱，每段长五尺，广一尺五寸，厚一尺一寸；上外棱混二寸；混内一寸凿眼立排叉柱”^[10]。可知“土衬石”是城门排叉柱基础所铺砌的条石，它与门道路面齐平。而土衬石的有无，是门道结构的变化，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地袱之制，《营造法式》中记载很详细，梁思成在对该书第三卷中“地袱”的注释内提到：“‘城门石地袱’是在城门洞内两

边，沿着洞壁脚敷设的……上立排叉柱以承上部梯形梁架”^[11]。可见地袱石是城门两侧立排叉柱的础石，在宋代已经很普遍了。从考古发掘的唐代城门的方形石柱础上立排叉柱，到地袱石出现，最后到《营造法式》的“石地袱之制”，这暗含着技术工艺和设计理念的提高，而土衬石的出现为“石地袱之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保证，这也证明由唐到宋，技术与理念的革新。从《营造法式》已有记载来看，在其成书之前，作为建造城门构件的地袱石就已出现了。

傅熹年根据考古遗址，结合《营造法式》的规定，并参考宋、元绘画资料，曾对汉唐宋元都城城门“门道基础做法”进行了类型分析，指出“据现有材料，汉、唐以来至元代，这种门道下部作法可分三型。Ⅰ型：用石柱础，础上用木地袱，袱上立木柱。Ⅱ型：用方形石础，础上立柱。Ⅲ型：用土衬石，石上用石地袱，袱上立木柱。由历史发展上看，汉长安城门属于Ⅰ型。南北朝城门尚未发现实例，但与之同时而受其影响的朝鲜高句丽时代的平壤罗城城门属于Ⅱ型。据此，可能我国南北朝时也出现Ⅱ型。解放后发掘出的唐长安、洛阳城门均属Ⅱ型。但在敦煌发现的绢画中也有Ⅰ型的例子，说明唐代Ⅰ、Ⅱ型并行。宋、元以来，据《营造法式》规定及前引诸宋、元画所示，多属于Ⅲ型”^[12]。宣仁门门道基础做法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是典型的宋代城门。

隋唐时期洛阳城经考古发掘的城门遗址，像郭城永通门^[13]、定鼎门^[14]以及皇城右掖门^[15]都是“一门三道”结构。其门道基础做法为，门道两侧安置排列整齐的方形或长方形石柱础，础石顶面中央凿有圆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础石之间有一定空隙。定鼎门以门道正中础石为中心，南北侧础石对称分布，且础石间空隙逐渐增大。这些城门门道基础做法都属于Ⅱ型，均未发现土衬石，柱础石彼此不相连，均有一定空隙，且门道

路面没有铺石、铺砖的现象。

在宋、元绘画中表现城门的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萧照《中兴禎应图》（图二），描绘了门道基础细部，是研究宋代城门的重要参考资料。《清明上河图》所画的城门可能是北宋东京城上善门的写生，而《中兴禎应图》所画也是北宋东京城门。通过这些画作可以对宋代木构城门的构造有具体的了解^[16]。这两幅绘画中的城门，其门道构造基本相同，不是用方形柱础，而是在门道两侧的地袱上置排叉柱，也能看出地袱间没有空隙。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排叉柱全部是直立的，而《中兴禎应图》中的排叉柱最外一根排叉柱向内倾斜，斜度与城墩表面平行。《清明上河图》中还能看到城门道路的路面是由方形石板平铺。

山东泰安岱庙正阳门始建于宋代。1984年对正阳门的考古发掘，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岱庙的历史延续。正阳门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为一门三道形制。三个门道两侧各排列一条对称的石地袱，地袱石下面通铺一层土衬石。门道中间各置一门砧石，门扉向内开启。从发掘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岱庙正阳门的筑基之制、门道构架、城墩形制、石地袱及门砧之制，还是在建筑结构的图案装饰方面，都基本符合《营造法式》所记载的规制。通过对正阳门的发掘，发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门道遗迹，而最下层保存比较完整，为宋代门址^[17]。结合《宣和重修泰岳庙碑》记载，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徽宗降诏增葺岳庙（岱庙），“凡为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观、廊、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竣工后，诏翰林学士宇文粹中撰《宣和重修泰岳庙碑》，确认正阳门应该是北宋徽宗时期修建。2005年发掘的岱庙西华门遗址，也是始建于徽宗时期^[18]。岱庙正阳门的基本构架，是在城门道石地袱下有土衬石，与宣仁门的结构相同。

综上可知，考古发掘的宣仁门遗址是宋代门址。结合北宋洛阳城的城建史，可推知宣仁门遗址应该是北宋徽宗时大修洛阳城时，按照新颁布的《营造法式》规制而营建的城门新形制。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猝薨，哲宗无子嗣位，哲宗胞弟端王赵佶即位，开启北宋王朝的徽宗时代。为维护正统和提高皇帝权威，徽宗采取多项措施建设都城，展现繁荣景象。在东京开封城大兴土木，修建礼制建筑明堂、铸九鼎等，同时也建设延福宫、艮岳、景龙江等世俗设施。作为北宋西京的洛阳城，也得到大规模重修改建，文献记载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一月持续到政和六年，长达五年。“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昇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貲”^[19]。文献仅记载了西京宫城的建设，工程规模和耗资巨大。

巧合的是，李诫的《营造法式》完成于



图二 城门石地袱与排叉柱示意图
（据萧照《中兴禎应图》局部摹绘，参见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第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是徽宗时代的开启之时。徽宗时代东京城的大规模营建，《营造法式》成为标准施工手册试推行，取得很好的效果。宋徽宗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敕令刊印，正式推行到全国。

徽宗时代洛阳城的营建，作为重要官府衙署所在的东城，也得到大规模的营建，东城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该时代的遗址。1984年在洛阳市西大街中州医院发掘北宋门址一座^[20]，1991~1992年在该门址北侧发掘了北宋衙署庭院遗址。庭院遗址位于东城宣仁门大街以北，在庭院东侧南端有砖铺道路与过厅踏步相接，过厅之南是1984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的宋代门址，且同在南北一条直线上。因此，“二者同属衙署的组成部分。其营建制度与宋《营造法式》所载大致吻合，是典型的宋代官府建筑”^[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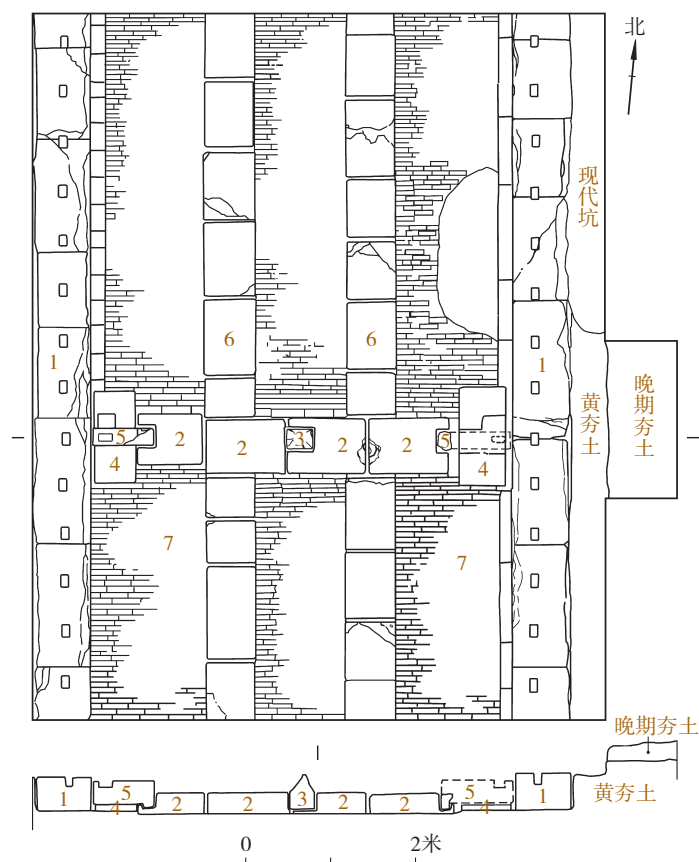
考古发掘的衙署门址是木构过梁式门，为“一门一道”規制。门道结构保存完整，由地袱石、门扉、砖石路面等几部分组成。门道宽4.65米，东西两侧有地袱石，地袱石彼此相连无空隙，地袱石上凿有长方形榫孔，以立排叉柱。榫孔共14个，等距分布，间距0.55米。地袱石为青石，平面呈长方体，制作规整，长0.9~1.55、宽0.6、厚0.4米。门道路面由相间的铺石和铺砖组成。铺石道由石条顺向平铺，南北向两排，间距1.55米，每排石宽0.55米。铺砖道与铺石道相间，南北向三条，中间砖道宽1米，两侧砖道位于地袱石与铺石道之间，各宽1.15米。砖道用长方形砖横向侧砌（图三）。

门扉位于门道正中，由门限石、将军石、两侧的门砧石和立颊石组成。门限石用四块条石

横列平铺，与路面基本齐平，将军石居于门限石中部的榫槽内。门砧石和立颊石结构完整，保存较好，门砧石上方形榫眼中有铁臼槽与铁鹅台残件。立颊石仅保留1块，卡在门砧石的长条形沟槽内，石上有长方形榫孔。

从发掘情况看，该门址建于夯土之上，两侧设地袱石以立排叉柱，门道路面有铺石道和铺砖道，门扉结构完整，其石作精工，结构严谨，大门向北开启^[22]。该门址的形制、门道结构都与宣仁门遗址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该门址地袱石下不见土衬石，而是直接在夯土上，这可能与其不是城门的規制有关。

1992年在门址北侧发掘一处衙署庭院遗址，主要遗迹有东西廊庑、殿亭、花圃、花榭，庭院中的砖、石道路和蓄水池及其交



图三 洛阳北宋衙署门址平、剖面图

1.地袱石 2.门限石 3.将军石 4.门砧石 5.立颊石 6.铺石道 7.铺砖道

互相通的明暗水道^[23]。庭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布局严谨，园内建筑及景点和谐统一。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该庭院遗址始建于北宋晚期。庭院遗址内出土大量的建筑材料，如柿蒂形卷草纹方砖，脊饰中的套兽、垂兽、兽面纹瓦当和菊花纹瓦当等都具有典型宋代晚期特征。在庭院遗址发现1块素面方砖，正面阴刻：“崇宁五年（公元1106）十口日九十号丁安汝州”十四字，表明这处衙署庭院的营建是在《营造法式》向全国正式推行后开始的。作为同一座建筑的组成部分，衙署门址应该也是这个时期营建的，同时这种地袱石和门道铺砖石结构的门址，是《营造法式》向全国推行后出现的新设计和建筑规范，所以该门址应该与衙署的营建时代相同，也应该是徽宗时代。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营造法式》推行时的谨慎，在西京洛阳城的建设中，先是以东城衙署的建设为试点，为西京宫城的大规模建设积累经验。

宋末金初，金兵南下，洛阳在战争中共几度易手，洛阳城池焚毁殆尽^[24]，表现在考古资料上为遗址被毁坏后形成的废弃堆积层。在洛阳城内，像右掖门、宣仁门、衙署庭院遗址等都存在废弃后的堆积层，而这层堆积是判断遗址时代下限的重要证据。衙署庭院遗址和门址都有这层废弃堆积，门址的废弃堆积为红烧土，厚达0.4米。红烧土中有大量木构件燃烧的灰烬和木炭，以及从木构件上脱落的铁饰件。这些铁饰件多已熔化变形，故可知衙署庭院遗址和门址均是宋末金初遭战火焚毁而废弃的。

在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城门封堵现象，已有学者关注并加讨论^[25]。其观点是正确的，特别像右掖门、宣仁门等封堵遗迹，都是在城门遭火焚烧而毁掉后形成的。右掖门的東西两门道“满填木炭、灰烬、红烧土块，两壁的夯土到处留下坚实的红烧硬面。东门道近底部被烧毁的木门和门楣，至今仍横塌于门槛前端。西门道除填

满灰烬外，类似木柱的较大型木炭仍填塞其间”^[26]。而宣仁门南门道石铺路面上发现多处火焚痕迹，许多石块都已被烧裂，墙壁上也多见火烤痕迹及焦糊斑块。可以推测，南门道是因遭火焚烧后废弃，后用夯土封堵。封堵遗迹应该与宋金战争有关，确切时代应该是宋末金初。宣仁门的南、北门道被封堵后，中门道仍继续使用。金初沿用宋代洛阳东城未曾改变，据《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记载：“先于正隆（公元1156年）初迁府治，自水南入城宣仁门里”^[27]，可知宣仁门继续使用，仅限于中门道出入。至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为升河南府为中京，进行了洛阳东城的建设，当时金昌府范围为：

“东据涧（应为“灋”）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城）一里”^[28]，规模比东城还小。元代沿用了金中京城，城市建设规模也未有起色。明代洛阳城的建筑规模比金、元时期有所扩大，宣仁门彻底废弃，其位置被西大街叠压。

综上所述，宣仁门遗址为北宋徽宗时代营建，使用了《营造法式》推行全国后出现的新规制。其门道基础做法的新特征，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

三、宣仁门研究再思考

综观宣仁门遗址的发掘，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受发掘范围、发掘时间等外在条件的限制，加之依据地层所提供的时代判定并不是特别精准，同时因对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不够充分，所以在对城门时代和沿革认定方面留有些许遗憾。

现代洛阳的城市格局，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发展格局遗痕的复合体，是城市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属于考古学上所说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所谓“古今重叠型”城市，是相对荒野型城址而言的，是城市考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根据城址的保存状况，针对那些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

址考古特征的总括。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唐宋以后的地方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对解决现代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具有指导意义，也是解决像唐宋以后沿用至今的城市形制沿革的重要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29]。

宣仁门遗址是古今重叠型城市——洛阳的一个缩影，在对其发掘时，必须遵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原则，从平面把握布局，从剖面解决沿革。但“古今重叠型”城市情况复杂，考古工作难度大，在考古方法与理念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遗憾。1996~1997年宣仁门遗址的发掘，受当时发掘条件的限制，更多注重把握平面布局。虽然可从铺砖石路面的破坏坑内看到早期门址遗迹，但未进行彻底解剖，因此对早期门址的情况了解不够，未能更清楚解释宣仁门遗址的时代变迁问题。为了解城市沿革、建筑结构及其营建过程，对于以“古今重叠型”城市为对象的大遗址考古，在清楚平面布局的情况下，不仅要做到重要的遗迹平面尽量全部保留，即“见面即停”，还必须要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即选准关键位置，解剖到生土为止。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考古发掘资料承载的历史信息，可以更好地探究古代城市、建筑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次第等问题，也为展示和复原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材料^[30]。

由唐到宋，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城市则聚焦了这种变化。“唐宋变革论”是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首先提出^[31]。宫崎市定认为“五代和宋以后，中国舍弃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国都移往交通都市和商业都市的开封……也在一个方面表现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格”^[32]。可见我国古代都城从长安、洛阳迁移至开封是唐宋变革期的一

大表现。宁欣也认为“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边疆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33]。欧美学者，特别是施坚雅（G.W.Skinner）称其为“唐宋城市变革”^[34]，都是聚焦城市在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唐宋变革”论成为观察、研究和阐释唐宋社会变化的一种研究范式^[35]。考古学方面，也很早注意到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在唐宋之间的变化^[36]，特别是徐莘芳，强调“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公元十世纪），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北宋末年汴梁城的城市景观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很形象的描述。临街设店，夜市达旦，与唐长安城的城市景观，截然不同，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37]。

洛阳城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舞台，其城市考古的每一处遗址，都是从细节上为唐宋变革做注解。而在唐宋变革的过程中，城市格局及建筑细部的变化，都是国家意志、技术革新、建筑理念等的动态变化，其背后都是人心之变。徽宗时代为提高皇帝权威，在东、西两京进行城市建设，展现繁荣景象，促使城市格局、建筑结构发生了变化，宣仁门遗址门道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设计理念变革在建筑细节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唐宋变革在考古学上的具体表现。所以，洛阳城的发掘和研究中，以唐宋变革的视角，时刻关注唐宋遗迹的叠压与打破关系，以及其中的细微变化，从考古学上来阐释唐宋城市的变化，进而研究城市变革背后的人心之变，才能达到“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终极目标。

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营造法式》颁行全国，成为当时政府颁布的权威性建筑设计及施工理论专书，内容详尽，图文并茂，“不愧为中国古代最为完善的建

筑专著和不朽的杰作,也是后世打开宋代建筑科学和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38]。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说:“《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研究宋代建筑、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39]。中国古代的城址是由城墙、城门、道路、水渠以及各类建筑组成,而城市考古所发掘的对象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密不可分。中国古建筑分台基、屋身、屋顶三段式结构,考古发掘的建筑,出土的砖、瓦等,都具有时代特征。洛阳城考古发掘的徽宗时代城门、庭院和各式宫殿建筑,是《营造法式》颁行以来的实践遗留,研究意义重大。《营造法式》完整地记述了宋代建筑设计、施工、用料、用工等建筑制度。对于筑城、筑基、筑墙的工序与工艺,以及用工、用料和消耗工具详细的计算方法,是通过夯土建筑遗址研究营造制度的重要依据。北宋西京洛阳城出土的各类砖瓦材料,与《营造法式》的瓦作制度、石作制度进行对比,对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时代、定名、尺寸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宣仁门遗址出土的门砧石、门限石、将军石、止扉石等各类门构件,在《营造法式》中都有描述。另外,宣仁门遗址中考古发现的地袱石和土衬石,都有准确的长、宽、厚尺寸,如地袱石长0.4~1.2、宽0.55、厚0.28~0.3米,土衬石长0.58~1.03、宽0.48~0.7、厚0.22~0.25米。按宋代官定营造尺(1尺等于30.9厘米)来换算,基本符合《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尺寸^[40]。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大型的聚落形态,城市与人类生活紧密结合,城市中的城门、道路、市场、官署、寺观、粮仓、宅院等要素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城市考古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系统研究工作,通过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残砖片瓦

寻找历史的轨迹,从琐碎的细节中发现空间的逻辑,从城市格局的变迁,探寻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宣仁门遗址考古,像一面镜子映像出城市考古的复杂与不易。对待不可再生的城市考古对象,我们必须心存敬畏,要认真把握其时代和埋藏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表及里、从上到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要素到系统,集腋成裘,逐渐形成对古代城市全貌的认识。对于古今重叠型的城市,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精耕细作的方法,考古发掘方能准确呈现古代城市遗迹,为城市发展保留历史遗迹,为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考古研究”(项目编号20BKG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LYD21019)的阶段性成果。线图由李振远、赵岩清绘。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1期。
- [2] 同[1]。
- [3] 陈良伟:《隋唐两京城门基本类型及相关问题》,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4] 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 [5] 李鑫等:《隋唐东都城考古所见城门遗址的初步类型学考察》,《洛阳考古》2013年第2期。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第25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7] 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

- 察》，《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 [8] 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 [9]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 [10]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第7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11] 同[10]。
- [12] 同[9]。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 [16] 同[9]。
- [17] 赵祥明：《泰山岱庙古建筑考古发掘与保护措施研究》，《古建园林技术》2016年第1期。
- [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泰安市岱庙博物馆：《泰安岱庙西华门遗址的考古清理》，见《海岱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9] 《宋史·地理志一》第2104页，中华书局，2013年。
- [2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第3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
- [22] 同[20]。
- [23]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第313~340页。
- [24] a. “（建炎二年三月丁酉）粘罕焚西京去。庚子，河南统制官翟进复西京，宗泽奏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宋史·高宗二》第455页，中华书局，2013年。
b. “（高宗建炎二年三月庚子）金左副元帅宗翰闻张严东出，自河南西入关，迁西京之民于河北，尽焚西京而去。由是进得以其众自山寨复入西京”。《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一》第2663页，中华书局，1957年。
- [25] 孙玉婷等：《隋唐东都考古所见城门封堵遗迹考述》，见《中国古都研究》总第26辑，三秦出版社，2014年。
- [26] 同[15]。
- [27] 《河南志·宋城阙古迹》第157页，中华书局，1994年。
- [28] 同[27]。
- [29] 许宏：《从元大都看中国城市考古》，《人民日报》2016年4月12日24版。
- [30] 李季等：《对话：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以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发现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0期。
- [31]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
- [32]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
- [33] 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关注》第22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
- [34] 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 [35]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6]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 [37] 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 [38] 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修订版）第2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 [39] 《〈营造法式〉注释》第5页。
- [40] 《〈营造法式〉注释》第194页。

（责任编辑 李 朵）

本期要览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18年马家窑文化遗存的发掘 2018年在喇家遗址Ⅷ1区的发掘,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存遗迹均为灰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年代为马家窑文化晚期。此次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马家窑文化遗存在喇家遗址的分布范围,为喇家遗址先秦时期聚落变迁研究提供了资料。遗址还发现有宗日文化因素,为探讨两者的文化关系补充了新材料。

湖南宁乡市炭河里遗址新屋湾地点发掘简报 2016年4~7月对炭河里遗址新屋湾地点的发掘,发现西周、东周和六朝时期遗存。以西周时期遗存最丰富,遗迹主要为灰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硬陶器、铜器、石器等,与炭河里城址出土遗物相近,年代在西周早中期。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炭河里文化的年代与分期,以及黄材盆地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与聚落变迁。

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遗址的勘探与发掘 2008年11~12月发掘了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东、西宫城之间宫墙上的宫门,并对周边进行勘探。揭露出宫门及其所在宫墙的建筑结构,新发现平行于宫墙的壕沟、宫城内道路两侧的夯土墙等遗迹,出土有丰富的文化遗物。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布局结构及历史沿革。

东周王畿地区用鼎制度新论 依据洛阳(王畿)地区东周时期墓葬内出土铜鼎数量、类型与组合差异,区分出三种铜鼎组合方式,即单件鼎、多件同型鼎和多件不同型鼎。据铜鼎组合变化,将此区域东周用鼎制度分为三个时期,分属制度尚不完善、完善到衰落三个阶段。揭示出洛阳地区用鼎制度的区域特点,也丰富了对中原地区用鼎制度演变规律的总体认识。

宣仁门遗址时代辨析 宣仁门是洛阳城东城的东门,据门道基础中出现土衬石及路面铺砖、石的做法,结合《营造法式》和宋元时期绘画资料,以及对东城衙署庭院遗址及其门址的分析,判断宣仁门的修建年代应在北宋徽宗时期。此外还进一步讨论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唐宋变革”研究范式、《营造法式》成书及其在洛阳城的实践等问题。